基于文化生态的潮州陈氏家族诗歌创作研究

A Study on the Poetry Creation of the Chen Family in Chaozhou Based on Cultural Ecology

王静彤 *，曹子健，郑妍晴，林仪炼，关煜妍

广州理工学院

摘要

明末清初的潮州社会变动剧烈，经历了战乱、休养生息和经济复苏的过程，地方文化也随之慢慢恢复。这一时期，潮州文人结社游玩、写诗唱和的风气十分盛行。潮州海阳县秋溪陈氏是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家族底蕴深厚，世代读书治学，生活富足，不用为生计奔波。这也让陈氏子弟有充足的时间钻研诗文、参与文坛活动。陈衍虞、陈珏、陈王猷祖孙三代，依托家族优势和潮州当地的文化氛围，积极加入各类诗社，结伴出游交友，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是明末清初潮州文坛极具代表性的文人家族。本文从文化生态视角出发，考察陈氏三代诗歌创作与地域文化生态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Chaozhou underwent dramatic social changes, experiencing war, recovery, and economic revival, during which local culture gradually regained strength. At this time, it was common among Chaozhou literati to form literary societies, travel together, and exchange poetry. The Chen family of Qiuxi in Haiyang County, Chaozhou, was a renowned scholarly lineage known for its deep cultural heritage. With generations dedicated to learning and scholarship, they enjoyed affluent lives free from the burdens of daily survival. This allowed the younger members of the family ample time to study literature and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literary circles. The three generations—Chen Yanyu, Chen Jue, and Chen Wangyou—leveraged their family's advantages and the vibrant cultural atmosphere of Chaozhou to join various poetry societies, travel and make friends together, and produce a large body of poetic and literary works, making them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literary families in Chaozhou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er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etic creations of these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Chen famil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cology.

关键词：文化生态；潮州陈氏家族；诗歌创作

Keywords: Cultural Ecology; the Chaozhou Chen Family; Poetic Creation

©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

一、陈氏三代生平概述

陈衍虞是陈氏家族文风兴盛的奠基人，也是潮州明末清初的核心文人。他是明代崇祯年间的举人，亲身经历了明清改朝换代和潮州的社会动荡。[1] 青年时期的他十分活跃，加入了潮州本地的凤台诗社、韩江诗社，经常和黄锦、梁应龙等当地知名文人结伴郊游。他们常登临潮州金山、西湖，泛舟韩江，一边游历山水一边作诗交流。除了本地交游，他还曾前往广州游学，拓宽了自己的文学视野。入清之后，他先后在番禺、广西平乐任职，辗转两广多地。晚年辞官回乡后，他重整复兴了莲山诗社，聚集本地文人开展诗文雅集。著有《莲山诗集》《莲山文集》，作品大多描写战乱见闻、山水风光和家国感慨，同时主持编撰潮州地方志，为潮州地方文化传承做出了很大贡献 [2]。

陈珏为陈衍虞之子，主要活动于顺治至康熙初年，是家族文脉的传承者。此时潮州战乱已经平息，社会趋于稳定，文坛氛围也从动荡悲凉转为平和闲适。得益于优渥的家庭环境，陈珏一生没有考取仕途，隐居潮州乡里专心研习诗文。他长期参与莲山诗社的活动，交往的大多是潮州本地的隐士文人和平素同窗。闲暇之时，他常与友人在潮州城郊、韩江两岸和田园山野间郊游闲游，以诗记录日常景致与闲居生活。其代表作是《二水山房诗钞》，诗作风格清新平淡，内容朴实自然，贴合当时潮州安稳松弛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为后代传承家学打下了良好基础。[3]

陈王猷是陈珏之子，为陈氏第三代文人，活跃于康熙至雍正年间。这一时期清朝统治稳定，潮州海禁放开，经济快速发展，书院和诗社遍地兴起，本地文学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他承袭祖辈的诗文功底，考中举人后，先后在曲江、肇庆担任文教官职，足迹遍布广东多地，结识了大量岭南文人学者。每次返乡潮州，他都会加入瀛洲诗社，和本地文人结伴登山临水、开展雅集酬唱。其代表作有《鸥汀集》《竹林诗钞》，诗文多记录游历见闻、讲学感悟和乡土风光，风格温润平和。[4]

总的来说，陈氏祖孙三代凭借优良的家学传承，顺应潮州社会与文坛的发展变化，通过诗社活动、山水郊游和文人交游，持续进行文学创作。他们见证了潮州文坛从衰败到兴盛的全过程，为潮州乡邦文学的发展与传承提供了重要助力。

二、陈氏家族诗歌意象的文化生态分析

（一）自然意象：从“载难”到“寄心”再到“纪游”

陈氏三代诗人自然意象的功能转型，并非单纯个体诗风差异，而是清初潮汕地域文化生态变迁下，生存处境、职业身份投射于诗歌文本的结果。在不同地域生态环境中，自然意象依次承担起“载难”“寄心”与“纪游”的核心功能。

陈衍虞笔下以“畏路”“安澜”为核心的自然意象，带有强烈的创伤特质，根植于明清易代潮汕滨海动荡的地域生态，以及诗人三次逃难离乡的亲身经历。《夜渡榕江》“十年成畏路，今稍号安澜”，是这种创伤记忆的凝练表达。[5] 明清之际，榕江作为粤东水陆要道，长期处于各方势力拉锯争夺之中，战乱导致水路阻隔、行旅凶险，“十年畏路”正是这一动荡环境的真实写照；句中“稍”字耐人寻味，表明所谓安宁只是短暂表象，长久的战乱记忆，让诗人难以相信自然界可以拥有恒久平静。顺治五年至十年间，潮州战乱频发，陈衍虞多次携家避难，甚至亲历亲人离世。对他而言，山水不再是传统文人审美赏玩的对象，而是裹挟生命风险、不得不置身其中的生存空间。“帆影连星动，鸟声到梦残”，将夜航的视听感受转化为内在心理感受：帆影随水波与星河晃动，暗含个体无根漂泊之感，对应易代士人身体

1. 温丹铭辑，吴二持校点。潮州诗萃 [M]. 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第 627 页。陈衍虞，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举人，亲历鼎革，是明末潮州文坛领袖。

2. 陈衍虞。莲山诗集 [M]. 清道光十九年凤城世馨堂补刻本；曾楚楠主编。莲山诗集点注 [M]. 中华诗词出版社，2006。晚年归里，参与修《潮州府志》《海阳县志》，复兴莲山诗社。

3. 温丹铭辑，吴二持校点。潮州诗萃 [M]. 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第 714 页。陈珏，陈衍虞仲子，隐居不仕，有《二水山房诗钞》。

4. 温丹铭辑，吴二持校点。潮州诗萃 [M]. 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第 761 页。陈王猷，康熙二十年辛酉举人，历官曲江教谕、肇庆教授，参与瀛洲诗社雅集。

5. 陈衍虞：《夜渡榕江》，《莲山诗集》，清康熙雍正间刻道光十九年世墨堂重刻本；参乾隆《潮州府志》卷七《兵事部》，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

屈于新朝、精神固守故国的身份撕裂；鸟声惊扰残梦，意味着即便是睡梦之中，也无法逃离乱世带来的惶惑不安。《准提阁夜宿》“云来巢几篁”一句同样饱含创伤色彩：准提阁本为清净禅院，云雾却漫至案几竹席，自然物象强行侵入人居空间。置于“客中兼乱中”的语境，即便是佛寺，也无法提供安稳庇护。温丹铭评价陈衍虞之诗为“吾潮明季清初之诗史”，正点明其自然意象的史料价值。受动荡生态影响，诗人以自然记录生存苦难，景物自然而然承载时代记忆，并非刻意以诗歌存史。当他称安澜仅仅是“稍号”，将云雾视作盘踞枕席之物，文本记录的就不是稳定的自然秩序，而是历经战乱的个体面对外部世界的警觉与疏离。

时局趋于稳定之后，地域文化生态发生转变，陈珏的自然意象转向以“云”“鹤”为代表的心性寄托，不必再像父辈一样为性命流离奔走。《冬日同友人游南岩精舍留宿次达上上人韵》“云停似欲依禅定，鹤立居然有道心”，是这一转型的核心例证。此处云气不再如陈衍虞笔下那般侵入居所，而是主动停驻，仿佛追随禅定之心；白鹤仿佛蕴含道心，“居然”一词，体现诗人以自我心境观照外物，并非客观描摹山水，而是借自然物象映照内在精神。全诗语境与此相呼应：“一路霜风落叶深”虽有萧瑟之感，但紧随其后“偶逢知己入空林”写出偶遇知己的欣喜，“古洞灯微涵冥色，夕阳钟动出寒音”构建幽寂的审美空间，最终落到“十年宰相浑闲事，聊与山僧和苦吟”的淡然自守。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诗中的“十年”，可以与祖父笔下“十年畏路”形成对照。陈珏并非完全抹去父辈的创伤记忆，而是选择以禅意审美对苦难记忆加以转化、安放。在安定的地域生态之下，其自然意象不再承担记录流离战乱的“载难”功能，转而成为士人抽身俗世、安放内心的精神载体。

至陈王猷阶段，粤东文教逐步兴起，地域文化生态再度转变。其长期担任学官，辗转曲江、连州、肇庆各地讲学，独特的游宦经历，造就以芙蓉山、武溪水为核心的纪游类自然意象，与陈衍虞的创伤书写、陈珏的禅心寄怀形成明显区分。《同诸子游芙蓉山》以游踪为线索铺展全诗：“出郭见佳色，始得春山青”开篇，继而写“汩汩武溪水，滔滔初欲平”，点明水系地理，“芙蓉削千仞，高无尘墙生”刻画山体峭拔样貌，由出城、登山至山顶远眺，纪游结构清晰完整。“康容去我久，留此泉源清”融入本地仙道传说，诗句自注记载汉代道士康容在此炼丹、丹灶遗迹尚存，可见诗人有意识地记录地方风物与掌故。这类纪游书写并非单纯描摹风光，兼具文学审美与地方风物记录的双重价值。三代人对“道路”意象的不同理解，恰好形成对照：陈衍虞笔下的道路，是心理层面充满未知恐惧的迷难之路；陈王猷的道路，则是亲身踏查、可以丈量记录的游访之路。同写行路意象，内涵却截然不同，正是清初潮汕文化生态变迁在诗歌当中留下的文本证据。

（二）宗教意象：从“避难所”到“安顿地”再到“交游场”

陈氏三代宗教意象的分化，同样根植于地域文化生态内生存环境与士人身份的变动。不同于自然意象侧重人与外部自然的感知关系，宗教意象聚焦宗教空间功能的代际演变，禅林空间依次成为乱世“避难所”、安定时代的精神“安顿地”，以及文教发展背景下文人的“交游场”。潮汕地区自唐宋禅风绵延，境内精舍寺院众多，士僧交往风气浓厚，为三代诗人书写宗教意象提供了本土文化基底。

陈衍虞身处易代动荡环境，潮汕地方豪强割据、战乱频发，生存危机是文化生态最突出的特征。此时禅院首要价值，是可供临时栖身的物理避难空间。《准提阁夜宿》“莲社偶投足，客中兼乱中”，“偶”字点明投宿禅院是乱世之中的权宜选择，漂泊异乡叠加战乱动荡，双重压力笼罩诗人。诗中佛灯、钟声等宗教意象都充满不确定性，“渡水钟疏密，巢云炬暗明”，钟声时疏时密，灯火忽明忽暗，这种不稳定感，正是诗人无处安身的心理投射。在这一阶段，诗人和禅院之间不存在稳定持久的联系，到访寺院带有偶然性、被动性，宗教空间尚未融入诗人日常生活体系。

随着清朝统治稳固，战乱不再是士人日常体验，地域文化生态发生根本性变化，陈珏与禅林空间的关系由被动避难转向主动寻幽求静。《冬日同友人游南岩精舍留宿次达上上人韵》“古洞灯微涵冥色，夕阳钟动出寒音”，“涵”“出”二字体现诗人主动沉浸于禅院营造的清幽氛围。尾联“十年宰相浑闲事，聊与山僧和苦吟”，将世俗功名视作身外之物，价值追求由外在事功转向内在心灵的平和。依托相对稳定的地方文化环境，陈珏不必再借寺院躲避兵祸，而是主动进入禅林，在僧俗唱和之中寻求精神安宁。对比陈衍虞被动避难的模式，陈珏和宗教空间形成半稳定的关联：结伴访寺、留宿精舍、与僧人诗歌酬唱都是主动选择，但禅林并未和自身职业身份形成制度性绑定。

©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

发展至陈王猷，职业身份成为影响宗教意象书写的核心变量。蓝鼎元《陈广文小传》记载，陈王猷历任曲江、连州司铎、肇庆教授，四处讲授经史、教化生徒。[6] 寺庙对他而言，既不是躲避战乱的庇护之所，也不是专门静心修禅的场所，而是外出游历讲学途中的文人交游空间。《下海山门观双沼新荷还入方丈小坐读图音和尚诗兼贻圆公》记录与僧人同赏泉卉、品读僧诗、相互赠答的经历，僧俗往来只是游山行程的一环。这种交往的日常化，来自学官身份带来的生活模式：讲学和访寺活动可以并行，宗教空间卸下生存重压与精神救赎的沉重使命，被纳入文人交游、文教寻访的场景之中。

（三）交游意象：从“诗坛网络”到“文献秩序”再到“教学场景”

陈氏祖孙三代交游意象的代际更迭,不只是书写场景的简单变化,更是清初潮汕诗坛从私人圈层联结,走向文献整理固化、文教传承制度化这一生态转型的文学表征，直观体现家族诗人在地域文学场域内身份与功能的变迁。

陈衍虞笔下“莲社”“同社”“盟友”自带组织属性，这类词语不以抒情为目的，核心作用是确认文人身份，划定可信的诗学同盟。明清鼎革，潮汕文人四散流离，结社结盟既是文学活动，也是乱世相互扶持的生存策略。陈衍虞名列复社，参与组建京社、晋社、偶社，《尔尔草》收录京师偶社七十余人校阅名单，施闰章为之作序；他不顾风险慰藉蒙冤入狱的郑茂蕙，同时与黄锦、吴六奇、郭之奇、罗万杰等粤东名士往来密切，依靠盟社纽带整合地方诗坛。“社”“盟”意象重在标记人与人之间的社群关系，而非抒发私人情感,诗人处在这张跨地域文人网络的中心位置,借结社确立乱世之下潮汕地域的文学秩序。

到陈珏笔下，“偶逢知己入空林”重塑了交游意象的内涵，诗句重心不在“知己”，而在“偶逢”：父辈那种有组织、可预先维系的社盟交往，转变为偶然、随性的相遇。“空林”作为交游场所，不再是诗坛网络上的节点，而是暂时脱离文人圈层的独立空间。意象的转向，和陈珏文献编纂实践形成对照。他与陈王猷合编《古瀛诗苑》，收录二百六十九位诗人共六百零九首诗作，又借助洪斌捐俸刊刻，把父辈流动的口头唱和、人际往来，转化为定型保存的文献总集。[7] 编纂工作本身具备严密组织性，但诗歌意象却透出空林偶遇的疏离感。这一矛盾恰恰说明，在流动的人际唱和固化为文本文献的过程中，诗人自身从诗坛网络中心，退居文献整理的幕后。稳定的地域环境，使他无需继续奔走结盟维系诗坛，转而以文献编纂延续潮汕文脉，推动地域诗坛从动态人际网络向静态文本秩序过渡。

陈王猷笔下“多士”“后学”的意象，和陈衍虞“社”“盟”形成本质差异：盟社代表文人之间平行对等的同盟关系，而多士、后学指向垂直的师生授受关系。陈王猷在多地担任学官，讲授经史、宣扬礼义，求学子弟云集，还在端州筹备丁祭礼器，组织生徒习礼演乐，将文人交游安置在制度化的教育场景内。此时文脉传承不再依靠私人交情维系，依托学官身份、师生关系持续延续。蓝鼎元所言“海阳陈氏以诗学世其家”，不再单纯是家族文学荣誉，而是需要通过教学传递的地域文化资本。需要厘清的是，清代官方学官本职为讲授经史礼义，诗学不在官方教学规定范畴内，陈王猷传授诗学，属于家族文学传统与个人志趣结合，是将诗学传承嵌入制度化的教育场景，而非纳入官方文教体系。“多士”“后学”意象的出现，完成了交游范式的转变：平行文人雅集，转向垂直、稳定的师生文脉传承。

三、从乱离纪事到平淡老朴：潮州陈氏三代诗风的变化及其动因

潮州海阳陈氏自明末陈廷策始以诗名，至其子陈衍虞、孙陈珏、曾孙陈王猷，四代皆有诗集传世。饶宗颐说“其子珏、孙王猷、曾孙学典皆工吟事，陈氏一门，以诗世其家”[8]。饶也提到“子孙十余人，皆以能诗名”[9]。这个家族的诗学传统绵延六代，堂号“世馨堂”，宗尚杜甫、韩愈的路径一直没断。但同一个传统在不同代人手里，面貌并不一样。陈衍虞的诗是乱世里逼出来的，陈珏开始转向地方文献的整理，陈王猷则写得平淡老朴。这中间的变化，不能只看作个人才性的差异，而是时代条件、家族文化

6. 蓝鼎元：《陈广文小传》，《鹿洲初集》卷八，清雍正刻本（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六六《礼部・学校・学校设官》，清光绪石印本。

7. 陈珏、陈玉猷编：《古瀛诗苑》三集五卷，清康熙五十四年刻本（或道光二十七年凤城铁巷世声堂补刊本），卷二、卷三《今集》；洪斌删订刊刻事见陈珏《古瀛诗苑自序》，载《古瀛诗苑》卷首。

8. 饶宗颐《潮州诗萃・序》，《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上。

9. 饶锷《潮州西湖山志》；温廷敬《潮州诗萃》。转引自潮州日报《推君者旧麟趾儿郎——陈衍虞与铁巷陈宅及宗祠》2025 年 2 月 2 日。

©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

资本积累方式以及潮汕诗坛整体位移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陈衍虞：诗里带着逃难的泥和血

陈衍虞一生因战乱三次避难离家[10]。现存诗作 1973 首，收在 13 种诗集里[11]。他的《尔尔草》收录顺治七至十一年间辗转岭东所作[12]。《泊西溪》《寨破后入平溪》《内子以贼警遂死平溪，挽之三章》《独客吟》这些篇名，一看就是血肉之作。有一首《次韵辜小愿》，回忆与友人避乱扁山岩的情景：“走载挑刀记逐忙，惊魂犹在水云乡。跑跟雨夜荆榛路，信宿蜗庐瘴岭阳”，末联“不堪痛定凭追忆，回首新亭泪万行”。乱离之感不是泛泛兴亡之叹，而是带着泥泞、瘴气和惊魂未定的身体记忆。研究者概括其诗风为“幽愤深杳，缠绵飘渺”[13]，并不夸张。《乙卯生日》里说“乱中驹隙驶，皇览又此日”，“家园伤久离，休影仍蓬革”，一个在乱世中饶幸活到老的人，诗里始终有一层灰暗。不过陈衍虞并非只写悲苦。康熙年间他参与修纂《潮州府志》，写有《凤城十咏》之类的地方风物诗。这说明他的诗风本身就包含了从乱离纪事向地方风物书写的滑动趋势，只是乱离经验始终是最强音。

（二）陈珏：编地方诗的人，诗风也在转

陈珏存诗不多，但位置关键。张士琏为他的《过庭集》作序，称其诗“触物感时，流连往复，皆能抒写其性灵，而畅达其胸臆之所欲言”[14]。措辞值得注意——“触物感时”而非“纪事述乱”，“抒写性灵”而非“寄托幽愤”。他的《江夜》：“篷窗凭望渺无涯日暮孤舟泊浅沙。几处清猿哀落木，满天寒露湿兼葭”，写旅途夜泊的苍茫，有哀意但不指向具体历史事件。他更重要的贡献是编选《古瀛诗苑》五卷，这部总集“流传闱里，风行至今”[15]。编地方诗总集本身就是一个诗学姿态：把关注重心从个人乱离经验转向地方诗歌传统的建构。杨之徐评《过庭集》说“才大运以精思，气昌纬以密理，既浑灏而流转，亦芳洁而妍丽。无体不有，无美不备”[16]。这个评价已经偏向艺术形式的讲究，而不是乱世中的“不得已而作”。陈珏成年时大规模战乱已过，没有陈衍虞那种切肤的易代创伤，诗自然从“存史”转向“存人”和“存地”。

（三）陈王猷：平淡老朴是怎么完成的

陈王猷是这一诗风转变的完成者。蓝鼎元说他“平淡出之，自觉老朴擅场”，又说“猷诗成一家言，能淑其乡之后学”[17]。他的诗里已经看不到祖父那代人的乱离气息。《帽峰山》写“空山如笠散秋烟，履齿西风寄远天。抱郭南流双水汇，压城高出一峰圆”，笔调疏朗从容。《由方丈右转上海山门》写攀爬丹霞山绝壁，“窥天刚半线，拔地乃千尺。鬼斧凿何年，俨有巨灵”[18]，用近乎写生的手法，不借险境寄托身世。陈王猷官至肇庆教授，蓝鼎元称其“在学尽职，无忝人师”[19]。他的诗风与学官身份匹配：诗不再承担记录苦难的功能，而成为文化教养的日常表达。从陈衍虞的“不堪痛定凭追忆”到陈王猷的“平淡出之”，三代人完成了一个从创伤书写到日常书写的过渡。

（四）转变的原因

最直接是朝代更迭的创伤。陈衍虞亲身经历明清鼎革、潮州反复拉锯和家庭流离，他的诗是不得不写的产物。到陈珏一代，战乱记忆退为家庭叙事背景，诗歌紧迫感消失。更深一层是家族文化资本积累方式的转移。陈衍虞以个人诗名和仕宦经历为家族赢得岭海文献的地位[20]，到陈珏、陈王猷时，家族需要的不再是“以诗存史”的悲壮，而是“以诗传家”的体面与可持续性。陈珏编《古瀛诗苑》、陈王猷“淑其乡之后学”，都是把诗学从个人表达转化为地方文化资本。第三层与潮汕诗坛整体位移有关。明末清初潮州诗坛以遗民诗人和抗清志士为主体，郭之奇、罗万杰等人诗中故国之思是主调。随着清朝统治稳

10. 曾楚楠《陈衍虞及其〈莲山诗集〉》，《潮州日报》2007 年 10 月 10 日。
11. 陈衍虞研究》，韦勇强指导硕士学位论文，万方数据，2022 年。
12.《陈衍虞研究》，韦勇强指导硕士学位论文，万方数据，2022 年。
13. 陈腾《易代文士生活的文学写照》，《中国民族博览》2024 年第 10 期。
14. 张士琏《陈珏过庭集序》，转引自 [] 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上。
15. 饶宗颐《潮州诗萃 • 序》。
16. 杨之徐《序》，转引自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潮学》上。
17. 蓝鼎元《鹿洲初集》卷八《陈广文小传》，识典古籍。
18. 诗文库“陈王猷 • 由方丈右转上海山门”。
19. 蓝鼎元《鹿洲初集》卷八《陈广文小传》。
20. 曾楚楠《陈衍虞及其〈莲山诗集〉》，《潮州日报》2007 年 10 月 10 日。

©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

固潮汕诗坛重心逐渐从遗民悲慨转向地方风物歌咏和诗学教育推广。陈王猷“潮人多宗之”，正是这一转向的产物。三代人的诗风变化，因此不只是一个家族的内部事务，而是潮汕地区诗歌生态从易代应激状态回归常态化的缩影[21]。

四、陈氏父子三人与潮州文化圈的联系

陈衍虞、陈珏、陈王猷祖孙三人是明末清初潮州“秋溪陈氏”诗学世家的代表，其家族素有“祖孙三举人，四代皆诗人”之誉。三人分别处于明清易代的不同阶段，共同构成了潮州文化圈中承前启后的关键链条。

（一）时代背景与整体氛围

三人生活于明末清初的乱世，亲历了明清鼎革、郑成功抗清、郝尚久反正、“迁界”等重大历史事件。陈衍虞一生因战乱三次避难，其诗作被后世誉为“潮州明季清初之诗史”。这种“潮属不清不明”、各方势力拉锯的动荡氛围，奠定了陈氏家族诗歌中深沉的纪实性与沧桑感。

（二）陈氏父子三人与潮州文化圈的具体联系

陈衍虞是家族诗学的奠基者，也是清初潮州文化圈交游最广的核心人物。他早年加入江南复社，晚年在本土与黄锦、郭之奇、罗万杰等潮州名士交往密切。他不仅是诗人，更是地方文献的守护者，曾以八旬高龄参与纂修《潮州府志》与《海阳县志》，被誉为“岭海文献”。此外，他还为潮州开元寺照壁题写“梵天香界”四字，其书法至今仍留存于潮州文化地标之上。

陈珏是家族诗脉的承续者，他以太学生身份继承了家族的诗文事业。他与侄子陈王猷共同选编了《古瀛诗苑》，这部总集对保存历代潮州诗歌具有重要贡献，体现了陈氏子弟在地方文献整理上的自觉。他的诗作《旸山即事有感》流露出退归隐逸、寄情旧里旸山的心境，反映了易代之后士人家族向地方乡野的内敛回归。

陈王猷的主要活动时期已在清初统治稳固之后，长期担任曲江、连州司铎及肇庆教授等教职。他延续了陈氏“以诗学世其家”的传统，所至之处“讲经史，明礼义”，使“文风翕然不变”。时人评价潮州“推敲者甚伙，颇自负，潮人多宗之”，而陈王猷正是其中“表表者”，其诗学成就被认为足以“淑其乡之后学”。他著有《蓬亭诗文》，诗风被认为“得力于美、昌黎”，在潮州本土极具影响力。

（三）陈衍虞：以交游辐射文坛

陈衍虞于崇祯十五年中举，这时已经四十岁了。入清后于顺治十四年授予番禺县教谕，康熙元年迁广西平乐知县。在平乐任上，富川、恭城瑶民叛乱波及平乐，他率乡勇击败，俘贼首十五人；巡抚率师亲剿时，役夫万人，居民惊徙，他出私财雇募，并恳请七县协济使“民赖以安”，得“陈佛子”之号。后因“由单迟限”被谪，引年乞归。

陈衍虞于崇祯十六年在京受阻时加入复社，结识了吴应箕，吴为其《旅心草》作序，称“吾盟友陈园公，所称文章之雄者也”，这在当时，算是很高的评价了。顺治十二年，陈衍虞再次入京会试，与施闰章缔盟京社，施氏在《序北征诸草》中称其诗证明“岭南多石少人”之说不确，“文章风流，几遍天下”。此外，他还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志结晋社、偶社，交游人物中地方士人占比最高。温丹铭评价他说“潮人声气之广，以园公为最”。陈衍虞“嵌入”潮州文化圈方式极为详细。他以八旬高龄参与纂修康熙《潮州府志》《海阳县志》，当时被誉为“岭海文献”。他的诗歌被温丹铭称为“吾潮明季清初之诗史”。

在本土交游中，陈衍虞常与郭伟节等地方名士诗酒唱和，《赠郭伟节》之类的诗篇记载着他与本土文人圈的日常往来。同时，他与辜朝荐等明代遗民之间的往来相较而言则显得更为沉郁，诗中不时流露出故国之思。陈衍虞的交游网络呈现出全国性视野与地方性根基并存的特征。一方面，其与复社、京社等全国性文人群体的交往，使潮州文坛得以保持与主流文学潮流的同步对话；另一方面，其在潮州本土的文献编纂与乡邦结社活动，又为地方文化认同提供了稳固的根基。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潮州文化圈

21. 综合饶宗颐《潮州诗萃·序》及温廷敬《潮州诗萃》编选体例。

©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

在明清之际既未走向封闭自守，亦未在与中心文坛的交流中丧失自身的地域声音。

（四）陈珏：以文献整理延续家族文脉

陈珏监生出身，未曾中举。他与父兄不同，并没有进入正式仕途，不靠官职谋生，而用地方文人的方式做事。他对潮州文化最扎实的贡献，在于他与父亲陈衍虞、侄子陈王猷共同编订的《古瀛诗苑》。这部诗歌总集系统收录潮汕地区历代诗人的作品，其意义远不止于文献保存。以往潮州所知的诗歌传统并不完整、没有统一脉络；而《古瀛诗苑》的出现正好可以补缺，把潮州文学纳入可查证的谱系或经典发展序列之中。通过选录与编排，陈珏及其家族为潮州诗歌定出一个“正典”，告诉后来者哪些作品应被记住、哪些人不应被忽略。

此外，陈珏还在雍正八年参修《海阳县志》，延续了其父以文献参与地方文化建构的模式。陈衍虞的文献意识通过家学传递给了下一代，而陈珏则与王猷形成了跨代的编纂合作关系。在陈氏一门“以诗学世其家”的谱系中，陈珏扮演的是承上启下的文献整理者角色：上承其父的诗名与文献积累，下启侄辈的地方文化建设。

陈珏的交游圈，相较于父亲而言收缩不少。他早年随父亲出入江南文社，结识过一些全国性名流，承接家族的交游网络；但在本土，他的社交重心明显偏向潮州及岭南诗人群体，与家族内部——父亲陈衍虞、侄子陈王猷——的诗歌赠答尤为频繁。这种社交形态的收缩并非退步，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聚焦。陈珏把精力放在诗艺的切与文献的整理上，他的工作让潮州诗坛在清初动荡之后趋于稳定，从内部巩固了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凝聚力。

（五）陈王猷：以教育拓展文脉

陈王猷于康熙二十年举于乡，他的仕途是典型的教职路线：历任曲江、连州司铎，后迁肇庆府教授，这与祖父陈衍虞的知县实职不同，王猷的职业生涯完全嵌入地方教育体系之中，所到之处以兴学育人为己任，重修学宫、振兴文风，将潮州崇文重教的传统向外播散。

蓝鼎元《陈广文小传》为他与潮州文化圈融合的提供了最详细的记录。王猷“所至讲经史，明礼义，多士负笈从学者虎舍为满,弦诵之声达街衢,文风翕然不变”。在曲江,射圃被榷部占为马,他力请上官清还;广文见榷部“皆罗拜庭下”，他“挺然长揖”，时人以为是。在连州，学宫倾，他捐货倡建，金千余完成;在端州，丁祭典礼阙略，他置办爵婢姐豆及乐器舞器，集生徒学礼习乐，“郡人以为创见”。

陈氏三代的文化成就，不是孤立个人天才的爆发，而是家族传统、代际传递的结果。他们在诗学传承、文献整理、地方教育三个维度上形成了互补：祖父以交游打开外部视野父亲以编纂保存地方记忆，孙子以教职将家族文化资本转化为持续的地方影响力。这种“诗学世家”的延续方式，本身就是潮州文化圈中一种独特的融合模式。

在社交与文化圈层上，陈氏父子连接明代遗民、清初名士、地方缙绅、学官士子，构建起覆盖粤东乃至全国的文化网络。陈衍虞将潮州声音带入全国视野，陈珏和陈王猷则在这一基础上巩固地方文化共同体。这种内外兼修的交游格局，让潮州文化圈既保持自身独立性，又与主流文坛互通声气，影响力得以持续提升。

五、结论

从陈衍虞到陈珏，再至陈王猷，地域文化生态的核心变量，由战乱之下的生存危机逐步转变为稳定环境中的士人职业身份；诗歌意象功能随之迭代：由载录苦难、依托禅林避难、结盟构建诗坛，转向安顿内心、禅林寻静、整理文献存史，最终走向纪游实录、寺院雅集、课堂传授诗学。这种代际变化并非简单线性的文学进步，而是每一代诗人立足自身所处的地域生态，不断调整自我文化定位的结果。

陈氏家族诗歌意象的演变历程，既是一部家族内部的诗学传承史，也浓缩了清初潮汕地区由动荡、修复走向文教兴盛的地域文化生态变迁过程，体现地域文化生态塑造文学创作，家族书写反过来滋养地

©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

方文脉的双向互动。陈氏三代的文化成就，不是孤立个人天才的爆发，而是家族传统、代际传递的结果。他们在诗学传承、文献整理、地方教育三个维度上形成了互补：祖父以交游打开外部视野，父亲以编纂保存地方记忆，孙子以教职将家族文化资本转化为持续的地方影响力。这种“诗学世家”的延续方式，本身就是潮州文化圈中一种独特的融合模式，也为理解地域文化生态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样本。

参考文献

陈腾 . (2024). 易代文士生活的文学写照——论明末清初潮州文人陈衍虞的诗歌创作 . 中国民族博览 , (10), 20 – 22.

陈王猷 . (无日期). 由方丈右转上海山门 . 诗文库 .

陈衍虞 . (1839). 莲山诗集 [清初刻道光十九年凤城世馨堂补刻本].

陈珏，陈王猷（编）. (1715). 古瀛诗苑 (三集五卷) [清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蓝鼎元 . (1732). 鹿洲初集 (卷八) [清雍正十年刻本].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 (清光绪).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卷三六六《礼部 · 学校 · 学校设官》) [清光绪石印本].

饶锷 . (1924). 潮州西湖山志 (十卷，首一卷) [潮安梁永昌印务局铅印本].

饶宗颐 . (2009).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九《潮学》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温廷敬 . (2001). 潮州诗萃 (吴二持，蔡启贤，校点). 汕头大学出版社 .

佚名 . (2025 年 2 月 2 日). 推君者旧麟趾儿郎——陈衍虞与铁巷陈宅及宗祠 . 潮州日报〔版次待补〕.

余业瑾 . (2022). 陈衍虞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

曾楚楠 . (2007 年 10 月 10 日). 陈衍虞及其《莲山诗集》. 潮州日报〔版次待补〕.

曾楚楠（主编）. (2006). 莲山诗集点注 . 中华诗词出版社 .

张士琏 . (清). 陈珏过庭集序 . 转引自饶宗颐 . (2009).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九《潮学》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周硕勋 . (1762). 潮州府志 (卷七《兵事部》)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杨之徐 . (清). 序 . 转引自饶宗颐 . (2009).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九《潮学》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作者介绍

王静彤，本科在读，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中文系。

曹子健，本科在读，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中文系。

郑妍晴，本科在读，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中文系。

林仪炼，本科在读，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中文系。

关煜妍，本科在读，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中文系。

©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

项目信息

项目名稱：基于文化生态的潮州陈氏家族诗歌创作研究（編號：CX202592）。

致谢

本论文得以顺利完成，离不开刘金冬老师、周立波老师、陈琼霞老师三位老师的悉心指导。衷心感谢各位老师从选题立意、框架搭建到修改定稿给予我们耐心点拨和宝贵建议。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负责的育人精神，使我们受益良多。同时，感谢组内五位同学一路相伴。我们在讨论中互相启发，在写作中彼此鼓励，共同克服困难，这份同窗情谊令我珍惜。

最后，向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师长、同学和朋友致以诚挚谢意。

©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